

# 一荤一素

□刘怀

“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。一个身影从容地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……”

每听一次这首歌，都禁不住泪湿眼眶，这熟悉的画面在眼前就越来越清晰。

别人都叫母亲，我却总不习惯。总觉得叫母亲就像母子之间隔了点什么，即便是尊称，也能感觉到一丝丝距离感，不亲切，不自然，我习惯叫母亲为我妈，这样称呼总让我感觉我还躺在我妈怀里。

我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。这12年间，我虽然失去了母亲的怀抱，但我凭借时时被勾起来的回忆，总能感受到躺在我妈怀抱里的温暖。不论是年节，还是读到文学作品某个章节，或是看到影视剧某个镜头、某句台词，或者听到类似《一荤一素》这样的歌曲，都能让我想到我妈，脑海里一下子就充盈了和我妈在一起的那些画面。

我妈是40岁时生的我，对我格外宠爱。小的时候，早晨醒来，枕头旁就会有一块饼干或者糖块，我妈说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给我的，她是怕我整天缠着她要，就编出来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白胡子老头儿。我就成天盼着白胡子老头儿来，也常常收到“他”趁我睡着时送来的礼物。上学以后，因为我学习好，我妈对我更加“特殊”，好吃的、有营养的都给我，菜里哪怕只有一片肉，我妈也会夹到我碗里，哥哥们只能干眼馋。有一个感冒发烧，就有水果罐头吃。晚上写作业时，偶尔还会有一杯麦乳精。中午放学回家，我妈就赶紧给我做饭，经常烙张饼或者擀点面条，趁我爸和我哥他们没在家，给我做点儿好吃的。我妈做饭时总让我烧火，于是，我妈在锅台边的身影是我熟悉的，所以，一想到我妈，就是那个扎着围裙在锅台边从忙碌碌的身影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家虽然父母都上班，但因为4个孩子，生活并不宽裕，但我妈却一直啥都可着我。我妈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要在4个儿子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，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我也幸不辱命，1986年，我考上了大学。记得收到通知书那天，我妈一下撇开手里的活儿，捧着通知书，乐着乐着就流起了眼泪，但笑容还是挂在脸上。

我结婚时，我妈拿出纸包纸裹的1000块钱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是我和你爸这些年攒的，你结婚用吧。”我不知道这些钱他们是怎么攒下来的。我读大学，爸妈就都退休了，我的生活费就得花掉一个人的工资。那时他们身体都不太好，生活加上吃药，一个人的工资怎么能够呢。我刚工作两年就结婚，他们每人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怎么能够攒下这么多钱呢，省吃俭用到了什么程度啊。我心疼，就暗暗下了决心，从此以后，我也要像那个在我妈枕头旁边放礼物的白胡子老头儿！

可是，我妈从来不肯麻烦我。我读书时，给我妈写信，总是报喜不报忧。结婚后，我妈给我写信也是如此。我担心他们身体，总是写信问这问那，但她总是说一切都好。直到有一天邻居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妈得了“蛇盘疮”，好几天没下来炕了。那时，我的三个哥哥都结婚分家单过了，我爸因为双目失明，已经在炕上躺了多年了。如今我妈也动不了了，是我哥和嫂子在照顾他们。乡镇的医疗水平有限，我妈的病大夫应付不了，就这样躺在炕上硬挺。就是这样，我妈也不让我哥他们告诉我。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家，看到我爸妈一人躺在炕的一头，当时那个心疼啊，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。我不顾我妈的反对，嘱咐嫂子照顾好我爸，就把我妈接到省城治病。

后来，我爸去世了，我妈跟我三哥一起过。三哥家住平房，冬天烧炉子取暖，又是烟又是灰的。我妈气管不好，我就把我妈接到我家。虽然我当时也是租房住，但我住的，就住我妈住的。我妈在我家16年，房子由租到买，由小到大。生活越来越好，日子越来越甜。我就想着法儿地给我妈买稀罕的吃，但凡在饭店吃点好的，就想给我妈买一份。出差到外地，只要是当地的特产，也一定买点让我妈尝尝。我终于有条件做一回白胡子老头儿了。

2012年初，我妈检查出肺癌，做不了手术的那种，医生说只有4个月时间了。我妈86岁，在我家是长寿的，但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妈即将离开我。我妈住院期间，我们哥几个成天陪着，跟她看牌，故意让她赢，换着法儿地哄她高兴。医生说，我妈的病房是全医院唯一一个每天都能传出笑声的病房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这笑声戛然而止了。那个每当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叫我回屋睡的人走了，那个不管我走多远都把我挂在心尖上的人走了，那个时时叫我“老儿”的人走了，我的“白胡子老头儿”走了……

“我妈做的面，一点葱花一点盐……”

歌声响起，我妈扎着围裙又在锅台边给我煮面了，不论荤素，我妈做的饭菜永远是最香的。



# 年夜饭

□于德北

今年雪大，亲友家的丧事也多，先是父亲的一个老同志离世了，父亲虽然不在了，但我们依然要替父亲去送一程。母亲也赞同我们这样做，人情不能完全随着岁月滔滔而被刻意掩埋。所谓无情，也正是这样的说法。母亲一直强调这一点。前不久，姑父也因病逝去。他和姑姑还有父亲、母亲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感情融洽，相处甚笃，所以姑父一死，母亲又一次受到冲击。

母亲很刚毅，年轻的时候就带着我和妹妹在乡下生活，和父亲两地分居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一个人用力。她太渴望团聚，所以，对年节的规矩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原则。多少年了，父亲在也好，不在也罢，逢节假日，全家必须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，一个不能少，且无论老幼，不准请假。如果某一个成员有事实不能参加，那就提前或顺延。

还有，必须以长辈为中心。长辈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她的规矩很繁琐，但我们也很受益。我们的内心都承接一份来自家的温暖，这份温暖足以让我们抵制任何生活中的困难。一个大家庭和睦、温暖，想必也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吧？

姑父去世是在年末，紧接着，立春了，马上就要过年。母亲已经85岁了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但她依然操持着年货的准备。首先是必需品，鱼——年年有余；鸡——要有积蓄；猪肉——抓钱；蒸熟的食材——蒸蒸日上；丸子的食材——团团圆圆。其次，还要亲自熬皮冻、制酱牛肉。各种青菜，冻梨、冻柿子，糖块儿，瓜子、花生，大小红包。

不比往年，往年这些都在她脑子里，今年，她找了一个崭新的本子，把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她对她说：“今年熬冻子，你来帮我吧，我一个人干不动了。”

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应着。她说：“你别对付我，眼瞧着到年根儿了，你得过来。”

我点头，表示我记下了。她拉着我，一起站到日历前，用笔一画圈点。

我们家就我和妹妹两个孩子，父母退休后，一直和妹妹生活在一起。妹妹的条件比我好些，姐夫是上班一

天一宿，可以连休三天三宿。老人有他们的陪伴和照顾，我们放心。工作忙是借口，我对父母的陪伴的确没有妹妹、姐夫多，日子久了，这也成了一种习惯。

每年过年，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三十儿即赶到妹妹那里，大家一起守夜，给父母磕头，上香，放炮，包饺子，往饺子里包钱和糖，然后在吃年夜饭饺子的时候，争着吃着出财富和甜蜜。

我如约去帮母亲熬冻子。母亲说：“去你家熬吧。”我一愣。母亲说：“从今年起，年年在你那儿过年、吃年夜饭。”我欣然同意。

几年前，我的单位搬迁，为了上班方便，当然也出于母亲年老的考虑，我在离妹妹家不远的南部新区买了房子。房子一收拾完，我就曾提议过去我那里过年，可母亲不同意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，我的工作很编写写，案头的事情一来，没日没夜，没时没晌，人多对我影响太大。往年那些正月，我的情况也的确如此，思路开阔了，抬腿就走，到了饭口，人再回来，热热闹闹的，也算另一番井然。

说了几次，未果。也只好顺从她。

听说今年要我去我那里过年，妹妹和姐夫都不同意，几十年的习惯了，猛地一改，总有诸多麻烦。母亲却一再坚持，他们也只好放弃自己的执念。于是，从小年就忙活起来，祭灶，吃灶糖，收拾猪肉皮，把该蒸的、酱的、煮的提前加工，年夜饭的菜单也定出来。

妹妹开始大包小裹地往我这里拉东西，今天一后备箱青菜，明天饮料、水果；姐夫把白酒、啤酒备上；孩子们也把单位分的福利送到我这里。我那本来挺宽敞的后凉台，也因此变得拥挤拥挤。

说实话，旧格局被打乱，孩子们很不适应。

可母亲有条不紊地协调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母亲把那个本子交给我，说：“这个你留下，以后过年不抓瞎。”

“抓瞎”是我们东北话，意思是没头绪。

母亲还嘱咐妹妹和姐夫去“青怡坊”买了一盆橘子树，并执意由她出钱。她让他们挑一棵树干粗壮的，结

满橘子的，要茂盛，要兴兴旺旺的。妹妹、姐夫知道取“橘”的用意，痛痛快快地把树搬了回来。橘子树进屋那天，她高兴得什么似的，围着橘子树转了好几个圈儿，一脸的满足把眼角的皱纹都拉长了。

除夕到，我们要开年夜饭了。

吃饭之前，我和媳妇、儿子要给母亲磕头的，妹妹、姐夫和外甥女也要行礼。然后，她把红包一个一个地发给我们。我们当然也把孝敬她的红包递上，递上一年的祝愿、祝福。

今年有点不同。她只收了我俩的红包，孩子们的红包她让我接，而且，给孩子们红包也让我发放，她决意撒手不管了。

妹妹开玩笑说：“妈，你这规矩改得有点儿太大了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你还是向着儿子哟。”

母亲只笑不答。

吃着年夜饭，拜年的电话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。姑姑的年纪小，母亲是她嫂子。每年都是姑姑的电话先来，给母亲拜完年，我们依次再给姑姑拜年。今年情况不一样，母亲把电话先拨过去，我们抢着拜年，之后，母亲拿着电话去了卧室，她们要说说姑嫂间的贴己话。

她们的说话的声音时大时小，我们听得也是断断续续，大致意思如下——

母亲安慰姑姑一番，并说好天一暖就去看她。姑姑自然地问，今年为什么改到我这里过年了？每年不都是在妹妹那里吗？

她们都走了，我们的来日不多，我们没了，孩子们过年不能没地方去。

她说，长兄如父，我不在了，他就得把这个事儿担起来。姑姑大概说，在妹妹那里过年还不一样？

母亲说：“我在，那儿是家，我不在了，儿子哪有去闺女家过年的道理？再说，我没钱了，闺女的娘家不能没呀！”一句话把我们的眼泪都说出来了。



这个叫孙乃儒的医生，成为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，可是，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找到他，没能当面谢谢他的救命之恩。

爸爸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，妈妈就用刚强乐观支撑起大半个家。她每天披星戴月，骑车到几十里之外的林场栽树，每天能挣一块二角钱；春暖花开，就搭火车去白城子卖自己孵化的鹅，每只鹅能赚二到四块钱；一年养两头猪，上交一头，自己杀一头，解决柴米油盐酱醋和日常零花。

在那个年代，妈妈在自家园子里种中草药、养鸡、偷着拿出去找老客户卖个好价钱。在空间有限的园子里，妈妈还种上黄姑娘、草莓，栽上樱桃、海棠、李子树，别人家小孩子走到我们家院墙外，经常要扒着墙头往园子里张望，一定也咽过不少口水。妈妈还在墙根下用塑料布蒙个蔬菜池子，餐桌上便增添了一茬又一茬的美味。

在妈妈勤劳智慧的操作下，家里还陆续添置了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收音机、挂钟、黑白电视机，盖上了砖房。更主要的是供我们兄妹俩上学念书，从来没有因为交学费耽搁过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，我家成为全大队唯一一户孩子全考上大学的家庭时，我妈脸上的皱纹都乐开了。

妈妈把满身的勤劳和智慧交给了这个家，把刚强乐观的基因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我。按理，妈妈一辈子受尽苦累，苦尽甘来才是常道。然而，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在我43岁春风得意的正当口，一场意外车祸却忽然降临在我身上……

一晃，我受伤已经16年了，妈妈就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了我16年。不知道妈妈看到她用生命换来的儿子躺在ICU里的时候，是怎样的痛不欲生，可当我出了ICU，看到的却是妈妈的笑脸。从不言弃的妈妈给了我战胜伤痛的勇气，永远挂着笑容的妈妈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力量。我知足、感恩、快乐地活着。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声：“妈妈，谢谢您！”

说：“合适，合适，还挺舒服的！”我一边说一边走了几步，又踩了踩脚，虽然硌脚却暖在心里。

母亲看着我儿子津津有味地嗑着瓜子，又听着我和爱人不停地夸奖鞋垫合适且柔软，脸上泛起了欣慰的笑容。

母亲67岁时，突患中风，偏瘫了。母亲胳膊蜷曲着，脊背佝偻着，她再也不能背着包袱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之间走动了。

母亲每天的活动范围从卧室到客厅，又从客厅再到卧室。她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，拖鞋底与砖面常常因摩擦发出刺啦啦的脆响。母亲每走一步，都会停下来，怯怯地望着我的房间，害怕打扰到我们的睡眠。我尽量表现出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，借以减轻母亲的不安。

我虔诚祈祷，多么想在偏瘫的母亲身上出现奇迹，就像储存在菜窖的白菜，再放到温暖的阳光下，从半颗菜心里冒出新芽，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

然而，母亲偏瘫的身体再也没有好转，她卧床不起了。

2006年7月，母亲溘然长逝。我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了放在床头柜上的包袱。我轻轻地解开，发现除了散发着浓重的药味和几瓶药外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两块轻飘飘的包袱皮儿。

母亲把爱全都给了我们。包袱虽空了，轻了，但是它又那么沉甸甸的，就像母亲那些深沉的爱。



# 蹉过岁月的河

□张继平

那年，38岁的姥爷在吉林省前郭县王府屯去世，撒下了4个孩子：大男、二男、大姨和我妈。妈妈当年才4岁。

妈妈5岁那年，随姥姥改嫁到赵家。赵家是大户人家，姥爷是供销社采买员，还供妈妈上了小学初中。妈妈14岁的时候，搭卖高粱秸的马车上街，马受惊翻了车，妈妈被砸到车下。那时的妈妈年龄小也没在意是否受伤，也正赶上姥姥因病去世（姥姥走时还不到50岁），妈妈被打算的事很快就被家人忘了在脑后。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妈妈的身体即便有怎样的不适也不敢声张，只能强忍伤痛，以泪洗面。

时间不久，妈妈受伤的部分患了骨结核。从14岁到16岁的两年时间里，从肋骨以下到髌骨以上，从脊柱到腹部，妈妈整个后背右下侧变成了黑洞。家里人看见妈妈有气无力，活命的希望不大了，就把妈妈抬着放到园子里的柴草垛边上，搭个窝棚，有人想起来，就给送点吃的，打算让她自生自灭了。

也许是苍天有眼，妈妈命不该绝。两年时间在生死线上徘徊，一粒药没吃，一针没打，就是靠自身免疫力战胜结核菌的妈妈，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愈合了。当妈妈自己从窝棚里站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……

妈妈的后腰右侧至今还有一个深5厘米、直径20多厘米的大坑。我常想，就是钢筋拧成的妈妈、就是生铁铸造的妈妈，也禁不起这么深痛痛的伤害啊！



# 母亲的包袱

□杨春生

母亲去世后，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是一块包袱皮儿，我一直把它保存在柜子里，珍藏在我心里。母亲哺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，两个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，妹妹嫁到大连，我在本市工作，弟弟在农村种地。

母亲善于筹谋，哪个外孙出生了，哪个孙子长高了，母亲便把做好的单衣棉衣等生活用品用包袱皮儿包好，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包袱奔波于我们之间。

一天，母亲对我和爱人说：“你妹妹下个月要生小孩了，我要去伺候月子。”

临走的前一天，母亲让我给妹妹买20斤小米，说喝小米粥下奶足。就在我准备把小米从邮局邮走时，母亲却拦下我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还没有老到连20斤小米都背不动的地步。”

就这样，母亲为快出生的小孩准备了春夏秋冬的衣服、棉被、夹被和一沓襦子等，并用包袱皮儿包好。我送母亲到火车站买了站台票。临上车

时，我把装小米的口袋和包袱系好，像搭搭袷似的搭在母亲羸弱的肩上。

“请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，送站的不要上车。”乘务员催促。

我托举着母亲身后沉甸甸的小米袋子，使劲往车里推母亲。母亲抓着车扶手用力往上挤，她的腰身艰难地扭曲着，汗湿透了衬衣，我不禁一阵心疼。车门关上了，母亲艰难地转过身，她把脸紧贴车窗上对我说：“多帮助你媳妇干点活儿，等你妹妹的孩子能扶炕沿走了，我就回来。”

母亲虽然走了，心却还在挂念我们……

之后的某一天，母亲背着包袱兴冲冲地从农村弟弟家回来，进屋就当着我们的面解开包袱，给我儿子拿出一袋瓜子，又拿出一双鞋垫。我知道这是母亲给我们做的鞋垫。鞋垫还没锁边，大小不合适，垫在脚下容易起棱咯脚。爱人给我使了个眼神，我心领神会。我穿着鞋不停地夸赞

